

理论的凸显： 社会史论战对史学的一个影响

罗志田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理论与史料的紧张颇困扰今人, 其实是个相对“年轻”的问题, 大致起源于北伐后的社会史论战。论战本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起, 却的确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首次受到理论(当时特指唯物史观)的冲击。初试啼声的理论与方法携手, 一鸣惊人, 气势颇盛。其间更提出了理论即结论的主张, 并提倡依理论以找证据的取向, 影响广远。这些现象共同彰显出一个显著的倾向, 即理论的凸显。尽管也有不同的看法, 理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史学, 中国史学的面貌因此发生了不小的转变。

关键词: 理论; 方法; 史料; 社会史论战; 唯物史观; 中国史学

中图分类号: C91-09;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1) 09-0097-11

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 理论和史料是怎样关联互动的, 或应当怎样互动, 是今日中国史学中一个绕不开也难下定论的重要问题, 曾引起很多探讨和争论。尤其理论与史料之间的紧张(有时甚至对立), 困扰了许多人。这样一个仿佛与生俱来的难题, 其实是个相对“年轻”的问题, 大致起源于北伐后的社会史论战^①。在那之前, 且不说旧派, 绝大多数新派治史学者, 估计也并未听说过和想过这样的问题。少数开始尝试和思考这类问题的人, 恐怕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了。

主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 本是为要解决现实问题而起, 参与者多不以史家为认同, 甚至并不从事历史研究^②, 却的确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界首次受到(特定)理论和方法的冲击。当时一个显著的倾向, 就是理论的凸显——在社会史论战之前, 很多治史学者恐怕连今日意义的“理论”二字都未曾听说过。而研究历史需要理论的指引, 故学人应有相应的理论素养, 虽是论战期间出现的新生事物, 却逐渐成为一个众皆认可的“定见”了。

理论自凸显之后, 便再也没有离开史学。尽管对理论的重视和强调有时断时续的特点, 史学的面貌却因此发生了不小的转变。本文不拟对理论的凸显做“系统全面”的论述, 仅概略勾勒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形成的几个延续性倾向, 如视理论为结论、依理论找证据等(这些倾向一开始就存在异议, 并在20世纪50年代再现), 希望能从昔年学者思考的轨迹中, 了解他们关注之所在, 探讨既往论述与今日研究的关联, 进而对化解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张力有略进一步的认知。

作者简介: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文化史。

^① 参见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 上海: 神州国光社, 1936年;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上海: 生活书店, 1937年;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翁贺凯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 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年。

^② 陈啸江就曾说“近来谈社会史者, 多是一般研究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的人们。”陈啸江《编后》, 《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第367页。

引言：以方法说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理论”和“史料”各有近义词。前者就是“方法”，后者稍多，“事实”“现象”等都是。如陶希圣说“方法是史学所必须，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①这里的“方法”就是“理论”的代名词，而“现象”和“事实”则是“史料”的代名词。

这些近义词常常被替换使用，表述的意思大致相同。当然，因为各人理解不同，有时虽用同样的词语，说的却不全是同样的意思，还需要从上下文中去体味。如在那时不少人的言说中，“方法”常是“理论”的近义词。然若严格辨析，两者的关联仍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特征。这类状况，也需要循其叙述理路，放在当时对理论和方法的特别认识中去理解。

当胡适说出“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②时，他实际开启了稍后流行的以方法说理论的取向，毕竟在一般认识中，主义之近于理论，是超过方法的。但细心的瞿秋白随后就指出，尽管“实验主义不愿意做锁闭的系统，他要成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弱点却亦在他的轻视理论”。^③比瞿秋白更严格的人，还要区分“方法论”和“方法”。如石衡就认为，方法论“是哲学或世界观”，而方法只是“技术”。像陶希圣那样在《食货》上“单把历史的方法与材料对立起来，畅论其孰长孰短”，其实是“‘方法论’与‘方法’的混同”。^④

然而，那时多数人并未像石衡一样辨析“方法论”和“方法”，两者的“混同”才是更普遍的现象。他们常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陈述着介于“哲学”和“技术”之间的“方法”，有时是近于“方法论”意义的，有时也真就仅是技术层面的讨论。具体说的什么，常需要据其上下文的语脉定其所指。下面的讨论，也会遵照时人的言说习惯，就其表述探讨其所欲言，而不侧重名相的抽象辨析。用陶希圣当时的话说，就是多注意“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⑤

正是在“哲学或世界观”的意义上，石衡进而提出，“历史的方法论就是历史的唯物论”。^⑥这反映出社会史论战时形成的一个共识——所谓理论或方法，具体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亦即我们通常说的唯物史观。^⑦李秉衡也明言，“所谓方法，指Dialectical Materialism而言”。他曾说，“于‘史料’中提供理论与方法，如解释为一种方法中的技术，似尚可以”。^⑧可知他所说的“方法”并不在技术层面，似更接近石衡的意识，但他仍表述为“方法”，而不说“方法论”。

无论如何，更多是一种理论的唯物论既然成为方法，则方法与理论的关系，就真有一体两面的意味了。王瑛就肯定地说，“方法——在普遍上说——亦即理论”。盖从理论与方法的关系上看，既“没有不可方法化的理论”，也“没有不可理论化的方法。愈是普遍基本的理论，愈可变为普遍的方法”，故“理论与方法不但无绝对的差别，二者间实尚有必然的联系在”。^⑨李秉衡也引他人所说“方法与理论底分别原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来论证“方法固然是理论获得的工具”，而

①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45页。

② 胡适《我的歧路》（1922），载《胡适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③ 瞿秋白《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新青年》（季刊）1924年第3期，第11页。

④ 石衡《对于历史的方法论一点浅薄的贡献》，《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第4期，第1页（文页）。

⑤ 陶希圣《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1933），载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陶希圣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15页。

⑥ 石衡《对于历史的方法论一点浅薄的贡献》，《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第4期，第1页（文页）。

⑦ 这一特色后来传承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理论”也是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用翦伯赞的话说，“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翦伯赞《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1963），《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⑧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1-2页。

⑨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6-7页。

“方法之成立也须理论为基础”。^①有些人虽未正式表态，似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如陶希圣在说“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时，一转口就说《食货》“除了想供给任何理论家以些微的根据外，并没有想妨害任何理论家的理论”，^②显然是把两者当成近义词在使用。可知这一倾向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从清季开始，中国曾出现过一股“方法热”，包括梁启超和胡适在内的学人都纷纷言方法。^③尽管不是有意的，以方法说理论的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或也借助了方法的热度，使理论的凸显与世风接轨。^④不过唯物史观的方法与一般的方法不甚同，有自身的特性。胡适虽可说开启了以方法说理论的取向，他所引进的实验主义在方法层面偏工具性，更接近石衡所说的技术性方法，可以对接不同的理论，也容易嫁接到类似整理国故一类工作上。而唯物史观的方法则偏向哲理性，更接近于石衡所说的“方法论”，似乎只能通向理论，而且是它自己的理论。

同时，马克思主义追随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又导致其在中发展出一种兼具方法和理论的特性。据胡克（Sidney Hook）的研究，马克思是把唯物史观“当作一种理解和创造历史的方法提出来的”，而他的追随者“力图把它变成一种社会学的体系”。^⑤这一倾向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时已有所体现，如顾孟余就说，唯物史观既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观察法”，又是“一种空前的社会哲学”。^⑥在这样的氛围下，理论和方法的走向统一，仿佛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发展。

对一些时人而言，这样的理论或方法，在史学上还具有“结论”的先验意义。用李秉衡的话说，就是心里“先要有一个‘先在观念’的假设”，亦即先有“‘结论’在心里”。^⑦社会史论战时，一些人就提出了理论或方法就是“结论”的主张。

一、理论即结论的主张及其影响

王瑛明确提出，应“把方法当结论”。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把方法当结论，在原则上是妥当而正确的”，甚至“唯有把方法当结论，才能有所成就”。^⑧李秉衡引叶青关于“凡理论都是一种结论”的话以为据，视此为“一种基本的知识”，并呼应说，“理论与方法即是结论，此种肯定，凡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踌躇的”。^⑨

陶希圣对此有保留，以为“如果把方法当结论，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易陷于公式主义”。公式主义的表现是“不尊重事实或材料”，而“历史的研究必须顾到历史的事实”。^⑩王瑛并不担心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他看来，“用什么理论作方法，定得出什么结论”。^⑪所谓“公式”，本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含义，故“把方法当结论”，就是一种求仁得仁的取向。

①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3页。

②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45页。

③ 清季的“方法热”与新兴的教科书关联密切，或受日本影响，更久远的本土渊源则是作为方法的考据在清代成为一种涵盖广泛的学问。参见罗志田《方法成了学名：清代考据何以成学》，《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

④ 许冠三就说，对于20世纪30年代理论的地位上升，不能忽视“胡适及其弟子推波助澜之功”。他甚至认为，“以实验主义为背景的方法学派和以辩证唯物论为本源的唯物史观派”在学术界虽“势呈水火者数十年”，却对“方法与理论不可分割”这一看法有共识，说或稍过。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2页，“自序”第7页。

⑤ 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97页。

⑥ 顾兆熊《马克思学说》，《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号，第452页。

⑦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3页。

⑧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6页。按许冠三已论及“把方法当结论”的主张及相关辩论，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77-179页。

⑨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2页。

⑩ 陶希圣《〈方法与材料（通信）〉按语》，《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4页。

⑪ 王瑛《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7页。

并不以“进步”著称的胡适较早就说,唯物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①。这大体是肯定其在基本认识方面的开拓作用。然而,开风气与下结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唯对社会史论战中的很多人而言,唯物史观既是方法,也是理论,而且还是结论。在这样的认知下,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如吕振羽所概括:

李季、王礼锡诸先生,他们对于历史材料,不但毫未去考证过,而且毫未用工夫去作过系统的搜求;仅在利用陶希圣先生等人的现成的搜集。他们只知搬运其陷于错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致连篇累牍的论争,彼此只是“断章取义”地在反复搬运麦、恩、伊诸大师的阶段的文句,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的具体事实与其活现的面目。因而在他们所写出的,并不是作为世界史之一部分的中国的历史,而完全是一种死的一般社会学的抽象的公式。^②

上引文中的“麦”,约即一般所说的“马”,“伊”是伊里奇即列宁。稍后翦伯赞也说:

当时参加这一理论的斗争者,如李季、陶希圣、王礼锡、胡秋原、严灵峰等,都一味忙于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因而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③

两位都是名正言顺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他们的观察如此,则当时风气可见一斑。两位又都使用了“公式”一词,特别能表现那些人的风格。不过,若不从事后评判的眼光看,那些人不过是在贯彻自己的主张——既然理论和方法就是结论,直接展示结论,也是一种省时省力的方式。

王宜昌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见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取向。他把“历史的材料”分为三类,“第一是物质的材料,即各代生产工具等实物遗迹;第二是记载的材料,即各时代的文献所记的历史;第三是理论的材料,这是一般的历史结论的逻辑体系”。三者都要被“深刻地利用”。^④民初较流行的一个倾向,就是把前人所说的“六经皆史”降格为“六经皆史料”。^⑤积极推动此说的胡适更曾明言,“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⑥。王宜昌的说法,隐约可见这一倾向的影子,不排除他受到其影响。^⑦

然而,这三种“材料”何者更重要,王宜昌自己是游移的。他起初认为,三种“材料的可靠性,是以物质的材料为最,而理论的材料为最次的”。因为“从理论的材料构成历史理论的神学阶段;从记载的材料构成历史理论的玄学阶段;而物质的材料,才会使历史理论成为实证的科学”。^⑧但后来他又说,在历史研究中,“理论、方法与材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他“将理论也说成理论的材料”,但他“更以为理论是最重要的东西”,决定着方法,而方法又决定着材料的取舍。^⑨

这种后来的斩钉截铁,或是一种眼光的“发展”。此前王宜昌更强调纵向的历史研究,他曾批评严灵峰的经济研究“只是一问题底横面的理论上的争辩,而没有历史上的追究”。其实除了横面的分析,还应当从纵面“立足于‘先存思想资料,当作出发点’,而作向前的研究”,进而“由后至前,

① 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1919年7月),载《胡适全集》第1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7页。

② 吕振羽《史学新论》(1936),载《吕振羽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44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8),载《翦伯赞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④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第40、71页。按这一期实际出版应在5月或以后。

⑤ 胡适就有这方面明确的主张,而颇得一些人追随呼应。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⑥ 胡适《我的歧路》(1922),载《胡适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⑦ 关于“六经皆史料”一说可能的影响,承厦门大学历史系梁心老师提示,谨此致谢!

⑧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第40页。

⑨ 王宜昌《关于反对读历史的话》,《食货》1935年第1卷第8期,第41-42页。

复由前至后的历史追溯与叙述，而求出种种不同的社会阶段和其关联”。^① 所谓从“先存思想资料”出发的历史追溯，当然更偏向非理论的材料。

那些直接把理论和方法看作结论的人，不一定赞同王宜昌的见解，但对于他们那种连篇累牍的旁征博引，不妨由此去认识。对秉持理论就是结论的人而言，既然结论已在那里，直接引用显然更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又何乐而不为呢？从他们的思路言，这是效率最高的取向。而如果理论也是一种史料，则引经据典只不过是侧重“史料”的某一类，或也是看重史料这一中国史学传统的另类表现，未必意味着有意要放弃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事实。

不过，理论即结论听起来似乎不错，却是一个易于空言而难以实践的取向，在具体操作中有着严重的问题：一是虽大家都号称尊奉同一理论，但各人对理论的理解未必相同；二是理论本身特别丰富，而征引不能不是片断的。前者还可以期待随着阅读的深入，大家的理解逐渐趋近（实际很难做到）；后者就操作层面言，其间的张力几乎是无法化解的。

杜若遗注意到，尽管时人都号称“以唯物辩证法为武器”，但各人所持的“唯物辩证法又各各不同”，结果是“各人由此达到各各的结论，而互相冲突起来”。^②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当理论就是结论时，如果各人所尊的理论或“正确的方法”名同实异，即运用者对理论或方法的理解本身出现了歧异，则结论自然也会各异。社会史论战最后并未达成共识，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就更成问题了。如前所述，那理论是特定的。而被视为经典的马恩列斯论述极为丰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汗牛充栋，绝非一言可了。在具体的研究和争论中，论者无论如何旁征博引，而所引的具体条文，也不能不是“寻章摘句”式的。由于立言时语境和语脉的不同，每一具体的条文所指，可能非常不一样。如果各引不一，而致结论和结论打架，那“结论”又怎样确立呢？

多年后，范文澜曾区分学理论的“神似”和“貌似”，前者“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而“貌似”则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成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实则是一种“教条主义”。^③ 这种“教条主义”倾向的特征，即“抓住一些条文作自卫的甲冑，又搬出一些条文作为攻坚的大炮，临时招募一些合适的史料作为摇旗呐喊的小兵，摆开阵势”，以吓退对手。^④ 这里的“条文”与上述理论和方法一样是特指的——“无非是马曰列云”。但这样“东抄抄，西扯扯；终日言，如不言”。^⑤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曾引用黑格尔的“人们可以替宇宙万物去寻找‘论据’”一语，来反对那种“抓住‘论据’中的一个”的论辩方式。^⑥ 范文澜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列宁这段话^⑦，以强调选择性抽取论据的不妥。而上引他所说以“马曰列云”的“条文”为主要攻防手段而“招募”合适的史料，正是列宁批评的“抓住”个别论据的做法。

范文澜说的虽是20世纪50年代理论再次凸显时的现象，却与20世纪30年代大体近似，甚或就是后者的延续。杜若遗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已指出，如果在搜集材料的时候“把史料割裂得太碎，会发

①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第53、3、29页。

② 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0页。

③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57），载《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87-388页。

④ 范文澜《百家争鸣和史学》，《学习》1956年第7期。

⑤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57），载《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⑥ 这是范文澜所据的旧译文，在新版中引文的两句分别译为“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和“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5页。

⑦ 范文澜《绪言》，载《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8页；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1953），载《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0页。

生歪曲其本质的危险”。有些人喜欢“引用史料中的一二句话去证明一个结论”，其实那两句话在“原书中的意义”，与“被引用时的意义”大不相同。^①叙述都是有其语脉的，“寻章摘句”使其脱离语脉，则表出的意思的确可能大不同。

论据和史料如此，理论本身亦然。列宁就曾特别批评在社会现象领域中“抽取个别事实，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因为这些例子“都只是历史具体情况中个别场合的事情”，必须“把它们作为整体地，有联系地来看”，这些事实才能成为“雄辩的”和“具有证明力的东西”。反之，如果它们被割裂于整体和联系以外，那就不过是儿戏。列宁强调，在社会科学中，“问题是讲到现象，而不是单个的事件”。实际上，“在社会生活极端复杂的情形下，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单个事实来证实任何一种意见”。故不应引用单一的例子和材料，而须掌握相关材料的总和。只有这样，才能“从各种现象中寻找问题的本质”。^②

这些论述到20世纪50年代都为范文澜所引用，以强化对举例式论述的批驳。范文澜强调，“搜集资料，应从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下功夫，不要作寻章摘句、玩弄举例游戏的手法”。他进而挖苦说，如果“用举例游戏的手法，明清可以用很多材料‘证明’是个奴隶社会，也可以‘证明’是个资本主义社会”。^③这里范文澜所说明清与材料的关系，同样适合于作为结论的理论。盖不论是材料还是理论，被引用的具体条文，其实都是被“抽取”出来的。当理论条文实际处于寻章摘句状态之下时，它们的可适用性其实是相当开放的。这就使“结论”相互冲突的可能性大增，而使“结论”的确立变得极为困难。

上面范文澜具体针对的，是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依据理论在史料中找证据的倾向。实际这一倾向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较显著，不过与理论即结论的取向相比，依理论在史料中找证据因为更向史料倾斜，已是退一步的取向。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人觉得应当从证据出理论，故提出了质疑。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提倡者表现得非常理直气壮，质疑者却且战且退，常带几分抱歉的意思，是个非常值得反思的现象。^④

二、依理论找证据还是从证据出理论

陶希圣曾总结社会史论战中上述倾向说，几年前“所谓‘方法’的，不是方法，乃是结论。当时的风气，是把方法当结论的。各人既有了结论在心里，只有向书籍里去找印证，不必广搜材料”。因为各人的结论不同，“所想找的东西”当然也不同。他自己的态度不一样，虽也重视理论，却不赞成“把方法当结论”，而更偏重材料。^⑤

但这一看法马上遭到质疑，王瑛以为，“中国外国古代今代材料之多，汗牛充栋，你如没有方法”，怎能做出鉴别？所以，“不懂方法，我们简直没法找史料”。他明确主张研究某学问“必先把握住一个理论——亦即方法——既有了一定的理论，搜集材料就可挑捡着搜了”。进而言之，“我们不

① 杜若遗《介绍〈食货半月刊〉》，《文化建设》1935年第1卷第4期，第10-11页。

② 转引自范文澜《绪言》，载《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40-41页。这里引的列宁译文是较早版本的，在稍后内容大致相同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中，范文澜改用了更新版本的列宁译文。参见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载《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1-242页。因为下文要述及范文澜的引用，为与他的陈述相呼应，只要没有文意的舛误，仍采用范文澜所见的较早译文。

③ 范文澜《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57），载《范文澜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2页。

④ 据余英时师的观察，自近代尊西趋新的大势形成之后，若是提出看似带有守旧意味的言说，都不得不“带几分抱歉的意思”。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98页。社会史论战时期理论和材料的对应，与此颇有些异曲同工，揭示出整体向理论倾斜的世风。

⑤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1934年第1卷第1期，第29页。

要说手下没有丰富材料，纵有，如无方法，何能组织它们”？^①

其实陶希圣先已说及，研究者心里预先要有一点疑问和假设，因为“总得有了疑问，有了假说，你才会去找证据的，你才能够找着别人没有说出的证据”。^② 所以他的回应是：

王瑛先生提出的抗议，我以十二分的诚意容受。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在心里，便无从搜辑史料，也无从广搜史料。没有方法的劳作，不独茫无涯际，并且漫无头绪……所以在研究的开始，便须弄清方法。^③

陶希圣进而说，他“曾经知道有搜辑中国经济史料到二百万字的人，对于土地制度的源流变迁，说不出条理来”，以此证明不知方法的弊端。这话可能有些说得口滑，在“中国经济史”不过刚刚萌芽的时代，以此为目的而搜集史料的人，应已是很“有方法”的劳作了。况且中国经济史虽是一个限定的领域，在其范围内也依然包罗万象；所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史记·儒林列传》），如果必须要对“土地制度的源流变迁”说出条理才算治中国经济史，恐怕中国经济史也已不是中国经济史了。不过现代学术模式的确对不那么现代的学人形成了不小的挑战，搜集了很多资料却不知如何转化成现代式“研究成果”的，应不在少数。

其实陶希圣的“十二分诚意”也只是客气话，他后面说出了自己的真意：

没有方法的劳作，和没有劳作的方法，一样是无用的。没有方法 [的] 劳作，所得到的只是史料的排列；没有劳作的方法，只是哲学或公式罢了……我不愿意大家只以方法自足。方法也须从观念里面走到历史现象里去，把历史的合法则性指出来，才算得是正确的方法……我们应当严守的方法，是从历史发展过程里面抽绎出来的。^④

明明不甚赞同，却要以“十二分的诚意”来表示“容受”，颇能提示当年理论和方法的光芒。李秉衡就明确主张，要用“理论—方法照耀着，贯通着，运用着一切材料，以组织有体系的知识”，故很有必要先存“结论在心里”。当陶希圣质疑说“先有一杜绝相异的材料的结论在心，再去找印证。我终觉这虽不是机械主义，却是公式主义”时，李秉衡则理直气壮地回应，“就是先要有一个‘先在观念’的假设，因为若没有假设，就不会有法则即理论”；故正要先有“‘结论’在心里”，然后“以材料印证我们的理论”。陶希圣反而退让说，他“对于‘假设’——以一般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史上，构成‘假设’，由此出发，搜集材料，作成与一般的理论一致的结论，完全同意”。^⑤

然而，陶希圣还是心存疑惑，他表示并不“反对有一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只不过自己“现在还没有看见过的花，却要铺开纸，掣出笔来描写”，感觉“是一个危险的方法”。^⑥ 王瑛反驳说，“这话我认只有部分的对，因为根本我们没见过的花，我们一定不能原形描出；但如已有人把它大体上告诉过我们，或者我们看到过与之相类似的花，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描绘个大概呢？虽不敢断定我们一定描绘的很像，但原则上或者亦不至相差太远”。^⑦

所谓“有人把它大体上告诉过我们”是具体有所指的——王瑛举的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中所说，就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言，产业发达的国家指示了较不发达的国家将来发展的姿态。就此言，如果历史发展之花是相类的，虽未见过，也可以仿照已见之花而描绘出来。更因见过的“花”是马克思提供的，就强化了前面所说要把方法或理论当结论的意思。

① 王瑛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6-7页。

② 陶希圣 《编辑的话》，《食货》1934年第1卷第1期，第30页。

③ 陶希圣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按语》，《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8页。

④ 陶希圣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按语》，《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8页。

⑤ 李秉衡 《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2-3页；陶希圣 《〈方法与材料（通信）〉按语》，《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4页。

⑥ 陶希圣 《编辑的话》，《食货》1934年第1卷第1期，第29页。

⑦ 本段与下段，王瑛 《研究中国经济史之方法的商榷》，《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7页。

李秉衡换一种方式说,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透过“有色眼镜”看问题“是必要的”。因为“有色眼镜乃经过若干年月、若干心血、若干验证所得,无劳吾人再度配制”。时代赋予中国人的任务,不是“创造新的方法,而为辩证地实践”。^①既然理论(或方法)就是结论,透过“有色眼镜”看问题不仅名正言顺,而且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运用既存的正确“有色眼镜”去找到合乎理论的史料。

如果说王瑛和李秉衡的一唱一和还是来自“他人”,食货学会成员高耘晖也认为,“研究一种历史,必要有这种学科的理论来指导”,且“所需的理论的重要是不减于所寻找的材料的。有一分见解,才有一分材料;有十分见解,则有十分材料”。^②这实际是呼应李秉衡所说的“方法不确当,则影响于材料之选择、鉴定与分析”。^③而王宜昌视理论为“最次的”转为“最重要的”之后,见解也和他们趋同,认为“理论确定我研究的观点与方法,观点与方法从而又决定我研究的材料之搜集”。所以,“要摆脱庸俗的社会意识,寻得适当的、必须的材料,则只有求助于历史科学底理论了”。^④

类似的攻防尚多,此不过揭示冰山之一角,但一方振振有词、一方支支吾吾的态势是明显的。当李秉衡说“使‘史料’验证吾人之理论与方法则可,凭‘史料’以求理论与方法则弊”^⑤时,那种斩钉截铁而不容置疑的口气,展现出发自内心的理直气壮。而如上所述,陶希圣在试图以史料对抗理论时就不那么义正词严,还时进时退。且尽管陶希圣有以诚意容受抗议的表态,他在对立面眼中,如前引石衡所说,仍是“把历史的方法与材料对立起来”的人。

真正把方法与材料对立起来的人在论战之外,前引高耘晖说“有一分见解,才有一分材料;有十分见解,则有十分材料”,与傅斯年稍早所说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形成鲜明的对比。傅斯年明确反对“疏通”,主张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故只宜“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⑥这才是远比陶希圣更坚决彻底的主张。

而石衡的看法特别能提示当年的流风。陶希圣实际主张理论和史料应当相辅相成,因为“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⑦他不过委婉地为史料说了一些话,就被认为把理论和史料“对立起来”了。换言之,理论凸显的程度已到对理论的强调必须立场坚定,不容有丝毫折扣和但书。

依理论以找证据的取向,看起来与胡适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科学方法”是相通的。不过胡适说了,科学态度在于“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无论怎样假设,若“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不能“奉为定论”。^⑧简言之,一切“待证的假设”,都“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⑨“假设”不妨大胆,却也是可以证为不成立的。而已经被视为“结论”的理论,是不容置疑的。所谓找证据,也是在此基础上的“找”。

进而言之,依理论“找”证据的取向有着很强的选择性。由于各人对理论的理解本不尽同,对

①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2页。

② 高耘晖《分工研究的方法(通信)》,《食货》1935年第2卷第2期,第4页。

③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1页。

④ 王宜昌《关于反对读历史的话》,《食货》1935年第1卷第8期,第41-42页。

⑤ 李秉衡《方法与材料(通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9期,第2页。

⑥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载《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62页。其实傅斯年知道“两件事之间,隔着一大段”,要“把他们联络起来”,是需要也容许“涉想”的。但这“旨趣”是针对全所特别是要进所的年轻人的,所以不能不说得更加旗帜鲜明。关于傅斯年对“疏通”的态度,可参见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中国文化》2010年秋季号。

⑦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1934年第1卷第1期,第29页。

⑧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载《胡适全集》第4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73页。

⑨ 胡适《我的歧路》(1922),载《胡适全集》第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9页。

理论具体条文的引用也是各取所需。这本身已是一种“找”，带有明显的选择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论证（以条文表现的）理论寻找证据，不啻是又一种“找”。在此双重选择之下，所得到的依据虽与要证的理论吻合，却也强化了证据的“个别”特性，其所具有的代表性已难说，其说服力也存疑。

在社会史论战时期，重视和强调理论的倾向显然是占上风的。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理论探讨的喧哗后，学界也逐渐出现强调史料的趋向。在前引吕振羽的总结中，陶希圣就是偏向搜集史料者的代表。他当时的确说了，“方法是史学所必须，方法不就是历史”。只有“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①如果“材料是架空的”，也就无法“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②所以，他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并确实有“以后少写文章，多搜材料”的表态。^③

好几年后，据叶蠉生在延安的观察，唯物史观学派的发展已从“过去仅仅从事理论论争，走上对中国历史用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的道路”。^④这里的“中国历史”应指史事，似有从理论转向整理材料的意思。不过依理论以找证据的倾向仍有影响，而且并不限于唯物史观学派。又几年后，童书业再次反对“先定好一个主观的教条，然后到史料中去搜求证据，来证明这教条”的做法，因为有悖史学研究需要的“客观的精神和态度”。^⑤

然而，这种偏向史料的想法，在翦伯赞眼里似乎是“反动倾向”的表现。他总结性地表出了偏重理论一派人的主张，强调“任何学问都要依从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历史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搜集史料也不可能。因为史料并不像放在钱柜里的金银，随手可得；而是像矿石一样，埋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没有采矿学的知识，虽身入宝山，也只有空手而回”。同样，没有方法，“虽有史料，也不会成为说明历史的资料”，还是“不能写成历史”。^⑥

没有“正确的方法”，搜集史料和用史料来说明历史都不可能，可知理论和方法有多重要。理论凸显的态势或不如从前，流风并未衰歇。或因此，到理论作用重新凸显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史论战时出现的种种风气又有明显的再现，据理论找史料的倾向表现得尤其显著。翦伯赞说得很生动：“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材料，而且那些真有用的材料就会在你的眼睛里边突出来；那些次要的材料，它就回避了。”^⑦这大体是他此前观念的延续，但此时翦伯赞在史学界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了。

如果说这是理念的表述，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清楚看到同样的倾向。时因范文澜回应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时间的见解而引发了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详另文），在范文澜领导的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相关讨论中，共同意见之一是斯大林所说的民族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而范文澜“把资本主义时代的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找，这就很难完全吻合”^⑧。支持范文澜观点的章冠英也撰文说“探讨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必须把斯大林民族理论的精神与封建社会的特点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史料中找出秦汉以后民族要素业已具备的证据”^⑨。

两方面都清楚地表现出希望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史料中“找”出证据的意思。在稍后编成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一书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寻找”“找出”或“找不到”一

① 陶希圣 《编辑的话》，《食货》1935年第1卷第5期，第45页。

② 陶希圣 《搜读地方志的提议》，《食货》1934年第1卷第2期，第40页。

③ 转引自《编者的话》，《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第1页。

④ 叶蠉生 《抗战以来的历史学》（1941），载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83页。

⑤ 童书业 《时代思潮与史学》（1946），载《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55页。

⑥ 翦伯赞 《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1947），载《翦伯赞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⑦ 翦伯赞 《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1963），《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⑧ 蔡美彪 《汉民族形成的问题——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论》，载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40页。

⑨ 参见章冠英 《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一些问题的商榷》，载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226页。

类表述^①，表现出一种在意识层面和下意识层面对理论自觉或不自觉的依赖。社会史论战时的理论凸显只是一波冲击，此时唯物史观已高居主流，而研究者对理论的依赖显然也达到新的高度。尽管从后见之明看，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把握不一定非常准确，这一现象却特别能表现理论在当时所起的指导作用。

三、余 论

在20世纪30年代不少人的眼中，唯物史观一身兼方法和理论，同时又是结论，这对理论的凸显有直接的助推作用。而当时形成的一些具体倾向，到20世纪50年代再度显现（程度容有不同，表现也有些差异），提示出社会史论战对后来的跨时代影响。尽管这影响时断时续，那时出现的一些新风气还是体现出较强的延续能力。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重要论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汉民族形成问题）^②，很多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可知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有助于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相关论争。

如翦伯赞所说，社会史论战本不是单纯的学术争论，而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③，但论战对中国史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理论的凸显就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从那时起，关于历史应当怎样研究，就出现了新的认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特别是理论与史料的关系，虽不是长期居于中心，却也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或可以说，这一有力冲击多少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模样。

中国史学本有“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④的传统，但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受到理论冲击后，史料和理论成为两个不时对立的表征，其间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王宜昌关于理论也是史料的想法倒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思路，盖若把理论看作史料，不论是对理论的降低还是史料的提升，都即刻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他的见解似未见太多的呼应，但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那种对理论连篇累牍的征引，却真像是把理论当史料用。实际上，当年和后来的学者，一直在思考应当怎样认识和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

本文所引论者基本自认是秉持唯物史观者，表现出方法的确是他们的强项。然而有强项者也有弱项，如陈啸江所观察到的，那些史学以外的谈社会史者，“在理论方面或许能占些优势，然而应用到实际，他们底弱点便完全暴露了”^⑤。今日即使特别尊崇理论的人，也无意公开压抑史料中的地位，社会史论战时则大不一样。不过理论一方那种看似“得理不让人”的强硬，或也表现出一种隐约的不自信，所以陶希圣稍偏史料便被认为是把“方法与材料对立起来”。

其实不论是以理论为结论，还是据理论以“寻找”史料，都有着提倡者并未自觉的先天隐忧。毕竟到目前为止影响史学界的理论基本是外来的，亦即被引据的“结论”大多是基于欧洲的史事得出的。与社会史论战时相似，20世纪50年代人也一直在思考怎样使外来理论与在地“史实”“吻合”（详另文）。关键在于，如果其他研究者发现外来的结论与中国的史事不相吻合，有可能导致“拒绝欧洲社会所产生的社会学方法之应用”的结果^⑥，那就完全事与愿违了。

反过来，因为传统的失落，纪传体的方式被外来的“现代史学”模式所取代，清儒擅长就历代

① 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处。

② 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1938），载《翦伯赞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④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载《史记》（标点本）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7页。

⑤ 陈啸江《编后》，《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3、4期合刊，第367页。

⑥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第2页。

全史具体条文进行“商榷”的方式^①已不得不“失传”，甚至最接近现代模式的纪事本末体^②也很难仿效，因为它和“商榷”一样是面对全史而不计完成时间的，在计日程功的现代学术体制中实难以复制。身处新旧模式之间的学人的确可能感觉无所适从，一方面受传统影响可能仍在大量搜集史料，另一方面却困于不知如何变成现代式的论文和专著。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时曾提出：

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理论虽不是史料的单纯排列可以产生，理论并不是尽原形一摆就算成功了；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的。^③

三个“排列”的连用，醒目地表明了当时流行的倾向何在。隐伏在“排列”后面的，或者就是手中有了许多材料和理论性的条文，但要怎样组织成一篇现代论文或一本现代专著，心中并无成算，只好先按某种门类排列起来再说。前引金毓黻称赞赵翼“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大体就可见史学表述方式从“列举多证”到“明其事之因果嬗变”的发展。在此过渡期间，“排列”可能就是一个常见取径，甚至是尝试在理论指引下进行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新方式。

类似现象后来一直在延续，范文澜在20世纪50年代就自我批评说，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是“复杂而繁重”的任务。而他在旧本《中国通史简编》中代之以用“现象罗列”的“便宜方法”，“把互相有机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排列成许多各个孤立的现象”。却因没能弄清不同时空各事物之间“有机的内部联系”，反而“头绪紊乱，不相贯通”。他那时知道了写历史应说清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前一时期与后一时期、这一事件与别一事件、同一事件在此地此地与在彼时彼地”之间“有机的内部联系”，否则就会“头绪紊乱，不相贯通”，最多只能算“一本史料汇编”。^④

稍早陶希圣眼中“搜辑中国经济史料到二百万字”却似乎不知所云的人，大概也是挣扎于新旧学术模式之间的一位。在王宜昌看来，陶希圣等人自己也不过是“偶然地从任何历史时期中，感觉那些他们所要感觉的现象”，并“搜集一些材料，而杂乱地记下一些现象”。^⑤而在别的人眼中，陶希圣恐怕已经太偏重理论和新名词而疏离于史实了。^⑥这最能表现“理论凸显”冲击后学界对理论与史料关系缺乏共识，似乎人人都对别人的做法有些不满，却也不知道什么是众皆认可的“正确”方式。

类似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仍有所表现，不论是那些“追赶”新时代的学者，还是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史家认同的学者，都共同面对着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但在基本原则确认后，实际操作中仍取向不同，主张各异；竞存的看法、做法甚多，似并无一种明显占上风。于是化解理论和史料之间紧张的任务，就留给了后人。^⑦

责任编辑：刘 莉

① 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② 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参见王树民的《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本身非纪事本末体，却与钱、王二著不同，是以事为主题梳理的，近于纪事本末，也正因此而显得更“现代”。如金毓黻所说，赵翼对历朝之“一代大事”，能“列举多证，娓娓而谈，以明其事之因果嬗变，尤合近代治学之方法”。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8-259页。

③ 陶希圣《编辑的话》，《食货》1934年第1卷第1期，第29页。

④ 范文澜《绪言》，载《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8-9页。

⑤ 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2、3期合刊，第29、37页。

⑥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1935年5月），载《胡适全集》第2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9-304页；胡适《略答陶希圣先生》（1935年6月），载《胡适全集》第22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6-330页。

⑦ 参见罗志田《史料与理论：范文澜探讨汉民族形成的语境》，待刊。

The Impact of Social History Debate 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ominence of Theory

Luo Zhitian (97)

The bothering tension between theory and historical data is relatively “young”, since it roughly started from the social history debate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The debate was originally set up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but it was indeed the first time that Chinese historians were influenced by theories, specifically,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t that ti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y of theory and method, some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ory is the conclusion, and advocated the orientation of finding evidences based on theories. These phenomena together indicate a remarkable tendency, that is, the prominence of theories. History study since then has been done with theories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voices, which, as a result,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tudy.

On the Thre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Hu Xiaoming (134)

Theory and knowledge are identified as the two wheels of literary theory. However, they become increasingly lopsided, causing an internal imbalance for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two, theory bear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being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to 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forward-looking to the future society. In our time, we should not exclud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ut instead, we should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ideas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and construct its political value system.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e construction is to take Chinese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while digesting and absorbing the nourish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task for theoretical work, includ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forward-looking of theory can be metaphorically understood as to travel deep under the sea and to stand high on the mountains, which means the deeper we understand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China, the better we can produce real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